

重建均衡：中国政策新走向

□秦 朔

这几年，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抒情歌曲无疑是《走进新时代》。我们正在走进一个新时代，新千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 20 余年沧桑之变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也开始面临许多新问题、新头绪。中国社会的进步正在遭遇新的矛盾和约束，无论是发展资源方面的，利益分配方面的，制度规则方面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为了突破约束，必须寻找新的动力。

经过 80 年代的逐步探索 90 年代的高歌猛进和治理整顿，中国经济正在一个大的调整期里寻求新发展。借用一些经济学家的判断，中国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 1978 年至 1993 年是“双赢阶段”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区别只在于实惠的多少不同；从 1994 年左右开始是“零和游戏阶段”，即一部分社会群体的获益和另一部分群体的受害，同时发生。其显著表现是失业队伍的扩大和分配不公。

这样的划分也许太过绝对，因为很多现实的‘果’和过去的‘因’是连在一起的。但问题本身却不容回避在“改革与发展”的背景下不少社会不公正现象发生着，并已开始危害改革的民意基础。从愈演愈烈

的官员腐败，到资本积累的不择手段从官商勾结的“权力经济”到国有资产的化公为私；从社会分配的悬殊，到部分百姓的生计维艰……问题带来相应的民怨，而民怨积累到一定地步，就会触发社会的动荡与危机。

改革发展必须和社会公正原则相结合。这事关国家稳定之大局，亦关乎改革自身之走向。重建民众心理的均衡，重建经济发展的秩序，重建社会分配的公正，也就成为近年中国政策的新走向。

哪里是腐败的前沿？

中央反腐败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地方反，军队也反。7 月原解放军某部高级军官因贪污腐败已被中央纪委正式“两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其“贪污公款、受贿和渎职”涉及 1250 万美元。据说，这名高级军官涉嫌经济犯罪的问题主要有：私自挪用某部下属公司资金违纪炒股；收受走私分子贿赂 365 万美元；用自己的司机在香港及海外为自己敛财。除此之外，这名高级军官还涉及多项银行贷款无法收回，成为呆坏账等问题。

军队高级干部的腐败很少见诸

报端。这件案子的查处和曝光，应该视为军队反腐工作的一次突破。

自1998年夏天中央决定军办企业和部队脱钩后，军方在地方的许多经营特权已被大大削弱，而其插手走私等问题则开始浮出水面。

地方的反腐败工作，近年的势头更为猛烈。如果说过去是“抓一个教育一批”多是“点的突破”现在则是“一抓一批”，“一抓一片”是“面的攻坚”。而且“一抓到底”毫不手软。湛江走私案如是，厦门远华案如是。近期，深圳某市领导被拘留接受调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消息说他的非法收入将创下新的“官员腐败金额记录”。

这么多大案出现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以至有评论称“沿海是腐败的前沿”。改革前沿与走私前沿、开放前沿与腐败前沿，其间当然不能划等号，但至少说明这些地方的经济繁荣和资本积累，远不是那么干净。

在官员腐败方面，那些穷地方其实并不比特区落后多少。江西的胡长清是一例，湖北的孟庆平是一例，而成克杰带头的“广西现象”更说明，穷的地方也有贪官。以三峡工程为例，目前审计出来的违法挪用资金便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专家指出，中央每年支持地方建设的低息贷款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支出扶贫款100多亿元，但分别产生效益或到穷人手里的，各自不到80%和60%。所以说，比较沿海和

内地官员的腐败，很难说“谁是前沿”，谁的腐败基础更好，只能说“各有所长”罢了。当然，从具体形式看，可以作些比较。如“走私型腐败”无疑沿海占“地利”，而“买官卖官”的腐败，恐怕穷地方更厉害，因为那里其它的敛财机会比较少，“官位”投资是收益比最高的。

如果说高层官员的腐败与敛财，对于平民百姓的伤害还并不那么直接的话，某些地方基层官员的行为，就更让人愤慨。基层政权关系着共产党的为政基础，基层官员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最直接的纽带。然而，一些基层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可以说非常恶劣，愚弄百姓乃至鱼肉百姓的事层出不穷。光新闻媒体每天收到的投诉，想管都管不完。部分地方官员无心服务百姓，却热衷于和“大款”、“情妇”乃至地方恶势力混在一起，邪气压倒正气。

最近披露的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案，令人不能不震惊，这样一个与多起命案牵连、横霸一方、民怨如沸的私企老板，竟长期无人敢动，还当上沈阳市人大代表，和其所在地方的官员难道没有什么关系吗？前几年，广东某县境内修国道，县委常委们是在“包工头”主持下开会的，讨论的结果是“谁也别吃独食”，每人分5公里干干，走“共同富裕”之路。不少有良知的干部感叹，现在，在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里，当清官要大大难于当贪官。你不想同流合污，硬要当“清流”的话，其他人会

集体把你拖下水。更险恶的是，你要还不识相“屡教不改”的话，他们甚至会买凶手把你干掉。朱镕基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讲，我退休后，要是老百姓说这是个清官，不是个贪官，我就很满意了。总理是深知民情也深知官情的。

腐败可以赎买吗？

近期以来，中央在打击官员腐败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坚决措施，显示中央已经把腐败看成危害执政党基础的严峻问题来对待，决不会听之任之，更不会“不算旧帐”。官员腐败的代价正越来越高。一时的“捞一把”，可能毁掉一生，遗恨全家。打击腐败，已成为当前缓解民怨、重建社会大众心理均衡状态的重要手段。

对于反腐败，前几年曾经有些“新颖”的说法。一是打击面太宽、牵涉太广的话，会影响整个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所以要适可而止。二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难免出现一定的腐败，硬要追本溯源的话，反而使这些资本外流，不如让腐败者用一定的经济代价“赎买”其“罪恶”，赎买以后不再追究了。有人还建议，可以定一个期限，“既往不咎”以后谁敢腐败，一定严惩。

这些建议不能说都是恶意。但共产党的立场决定了它必须和腐败战斗到底，绝不可能坐视不管。北京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很通俗：“共产党连‘三陪小姐’都不承认其合法

性，可能容忍腐败的合法性吗？”

江泽民总书记今年在中纪委会议上讲：“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中发生的违纪违法事件越要严肃查处”；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否则，腐败之风刹不住，也难以服众。”此语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腐败者不依不饶的严正态度。“服众”就是让人民大众信服，人民大众能够允许腐败者“赎买自己”吗？

至于说反腐败“影响整个干部队伍”和“引发资本外流”实属无稽之谈。且不说干部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反腐败、其自身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如果干部队伍真的因为反腐败就“军心动摇”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更应该早点反腐败了，否则干部队伍岂不成了“腐败队伍”；中国共产党“岂不成了‘中国腐败党’了？谁会欢迎这样的党继续执政呢？说到“资本外流”就算共产党不严厉打击腐败，那些腐败者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积累的资本投资吗？这种不用来投资的躲躲藏藏的资本，真想外流就让它外流去吧。

近年来的许多反腐迹象已经表明，中国的反腐败将是一个长期的严肃过程，不是“走过场”，不是儿戏。只要共产党一天还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就不会对腐败采取“赎买”政策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而是“不容腐败藏身”；“新帐旧账一起算”。成克杰

一审判处死刑，对那些还抱有豁免幻想的腐败官员再次敲了重重的一记警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亦再次昭告民众与世界。反腐败一时的触动会大一些，但长期收益无限：凝聚民气 利于稳定 建设清廉的政府运作体系，降低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保卫社会公正。

近日 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推出一项规定：2000年10月1日以后 党政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 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 一律以贪污论处。款额不满1000元的，给予教育批评，责令写出检讨 记入廉政档案。款额在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款额在2000元以上（含2000元）的，一律先行免职 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这样的信息，相信不少地方也都会陆续出来。要真正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党和政府和群众之间应该是“鱼水关系”。而腐败之恶 不仅在于一部分官员“罪恶的原始积累”，更在于它破坏了“鱼水”间的均衡 使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任基础受到动摇。在中国重建社会均衡的过程中，过去的“畸形”和“失衡”一定要逐步校正过来。无论他们过去多么风光，高枕无忧，腐败者的命运注定将是悲惨的。除非侥幸逃脱 但终身心惊肉跳 或远走高飞销声匿迹 否则，“怎么吃进去的 怎么吐出来”。

由于中央铁腕的反腐政策，加上越来越严密的制度监管、政务日

趋透明化以及官员本身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弱化，事实上，中国官员的腐败高潮已开始大大回落。一个清算腐败者的高潮期倒是正在来临。

重建发展秩序

与东部沿海一浪接一浪的打走私反腐败行动相比，西部则沉浸在大开发的喜悦和向中央要资金、要项目、要政策的紧张争夺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是中国的一大隐忧，西部的资源又孕育着中国经济新的潜力。西部大开发，是中国重建地区发展均衡、缩小东西部差距的一大决策。不管实际进程是否如愿，西部至少赢得了一次巨大的发展机遇，并且赢得了相应的政策资源。

与西部的“开发”主题比 今年沿海地区的思考主题似乎是“双思”：“致富思源 富而思进”。“双思”是大框架，“富而思过”其实也在其中。“思过”，就是反思问题。而不少问题，很大程度上和80、90年代的发展思路是有关系的。

由于深受前一个时代的“斗争哲学”之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哲学”理所当然成为80、90年代中国的选择。改革与发展是我们时代最闪亮的名词。为了发展，中央不断向地方放权，地方的发展积极性、经济实力和向中央的“话语权”与日俱增。从大方向来说，这种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无疑是对的，但在制度建设没有相应跟上的前提下，不少地方的

发展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无论经济和社会代价都很高昂的“畸形的发展”。这种发展观的实质就是经济目标(产值目标)永远排第一。为了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发展观和地方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强烈冲动相结合,造成中国经济中发展和秩序的不对称、不均衡。发展超前,秩序滞后;“发展”成了一种更受欢迎、官员更爱听、比“秩序”二字优越得多的“话语权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地方“繁荣鼎盛”的“发展”、走私经济肆无忌惮的“发展”、假冒伪劣横行却有地方保护的“发展”、抗蒙拐骗丝毫不讲信用的“发展”、逃避银行债务招数迭出的“发展”、名目翻新的“圈钱游戏”的“发展”、严重牺牲环境资源的“发展”、为求政绩硬堆出来的“长官项目”和“吹牛经济”的“发展”、大量挤占耕地、非法出让土地的“发展”、挪用政府专项资金炒股盖办公楼的“发展”、各个部门争相设法收费敛财的“发展”、透支国家信用的所谓“窗口公司”的“发展”……这些“成果”不但不是人民心目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在阻碍真正的社会发展。以为播下的是“龙种”,实际收获的是“跳蚤”。

广东、福建在发展中的问题这两年已陆续暴露。就是江苏,大名鼎鼎的“苏南模式”现在也备受质疑。以“干部经济”、“政绩经济”和“对地方第一把手的个人崇拜”为重

要特点的“苏南模式”几年前已经困难重重。由于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很多乡镇所办企业都亏损累累,资不抵债。一位学者指出,苏南一些企业的领导做人、做事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一边讨好上面、一边收获个人利益上。搞企业是为了捞政绩、谋位子。为了争取“发展”,拍脑袋上项目,搞假合资假引资,夸大产值,乱吹牛皮,都成为当地的“时髦”。至于不顾地方财力、大兴土木、互相攀比、大作表面文章的城市建设,更留下许多难卸的包袱。

所有这些不义之富或短期行为造成的“发展繁荣”不可能持久(想想许多地方积压的房地产和废墟般的开发区吧)相反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甚至是经济、社会危机的潜在诱因(想想各地那些高息揽存行为的后果吧,在广东恩平,老百姓竟抬着棺材找政府要钱)。90年代中期以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建宏观上的调控体系,成为中央政策的一个显著走向。从分税制的推行,到加强金融、工商、海关的垂直管理,都是明证。中央要求更多的“话事权”,表明其对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笼子已破”(各地诸侯)“群鸟乱飞”的发展态势不再满意,开始调整。事实上,各地“乱飞”的很多苦果还是要中央背起来,中央给地方“擦屁股”救急。当中央财力严重不足时,也不可能为那么多地方伸

过来的屁股擦来擦去。

除了在经济政策上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作为执政党 干部的调整也是一种对地方施加影响的有力手段。在近年的中国政坛上，一些地方“封疆大吏”的更换和接踵而至的反腐地震，是颇有对应关系的。

从向地方倾斜到重建中央政府权威，在中央和地方间的这一新均衡建立之后，中央才有可能再向某些地方倾斜 如西部 从而解决地方和地方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中国近年重建经济和社会均衡的举措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均衡（清理污染 退耕还林 水土保持）对外开放和搞好国企之间的均衡（有学者指出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 1995 年就超过 45%，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 但同时 中央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努力一直在持续，近期起色明显）。而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方面 寻求人大这一“中国式的议会”和政府间的均衡 则是一个显著的新突破（注：《南风窗》7月号对此有详细报道）。以广东省为例，人大近日已经通过了《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于 200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该规定界定了 11 类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并由它作出相应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以及 17 类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常委

会可以提出意见、建议的重大事项。其出台背景正是要“监督政府行为”，不能听任公用事业收费政府说涨就涨，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处理的“灰箱操作”，和社会重要事项决策由于缺乏民主、科学程序和必要监督屡屡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人大倘若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对节制政府官员的“全能主义倾向”，促使高效清廉的“有限政府”的产生，无疑会有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中的均衡观

在美国超强、多极并存的国际环境中，经历了近年来和美国忽而伙伴相称、忽而怒目而视的恩怨，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恐怕不会再走那么多极端和弯路。近期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深度交往，以及双方在反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等方面的诸多共识，显现出中国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试图拥有更多和美国周旋的筹码，实现中美之间的更多均衡。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性的政策选择，既不反美，亦不崇美，而是认真准备好自己手里的牌。中国的对美政策 多了清醒 少了幻想。

正像南京大学的中美问题专家时殷弘描述的，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未来世界图景极其褊狭，就是欠发达世界将以其毁灭性武器扩散、大规模内乱、人口爆炸、难民和移民巨潮、赤贫、瘟疫、生态污染和崩溃等等，去威胁甚至毁坏西方的安全、

繁荣、种族、文化凝聚以及道德自信和良心安宁。从历史上看，美国缺乏真正容纳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加上冷战胜利引起的陶醉，其“权力的傲慢”更是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冷战的终结使“中国抗衡苏联霸权的价值下降，接着消失了”，中国“由地缘政治中的伙伴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主流传媒鼓吹的是“中国垮台论”，认为共产党很快就要垮台。到中国不但不垮、发展还挺快后，“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

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分野，使得任何对中美关系的过分乐观都是奢望。但是，不乐观并不等于不去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更不等于放弃努力。时殷弘指出，由于美国是当今及今后长时期内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争取同美国有较好的关系是中国必然作出的选择。要尽可能创造条件，争取美国公众及其民选代表对华认识和态度的逐渐改善。“中国对中美关系要有耐心，沉得住气，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尽可能不同美国对抗，更不去当头，不去全面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要敢于并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协。力戒在受困心理或富强感的刺激下，形成狭隘和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潮流，那会非常消极地影响中国的眼前和长远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国完全应当在根本问题上坚持原则，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并做好为此抗争的充分精神准备。一个在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懦弱的中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尊重，反而会使之得寸进尺。”

认识的深化，促成政策的调整。可以预言，中俄关系的密切，会帮助双方都找到更多与美国对话的“资本”，以及更大的对美政策的弹性。美国对中、俄的强势在一定程度上将会被削弱。

“重建均衡”背后的辩证法

中国当前政策中重建均衡的新走向，不是对过去发展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符合可持续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人民更加拥护的新发展。富而思进，共同富裕，更好进步，这是根本目的。

重建均衡，不是走向“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一个在动态发展中实现的过程。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是要拉住东部的发展步伐，而是要通过西部更快地开发。在此过程中，东部还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从长远角度看，重建均衡要逐渐从政策范畴走向制度范畴。从湛江到厦门的走私腐败大案，如果不是最高当局断然派员介入，靠下面地方查、省里查、自己查，要解决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恰恰说明，现在的监督环境和司法制度极不健全。光靠政策去解决问题，能收一时之效，难收长远和根本之效。

真正持久的社会均衡，还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达、崇尚法治、

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政府以民为本等基础之上。要牢固建立这些基础，我们需要优化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深化政治的改革。均衡的重建，肯定要打破许多既有的利益格局和习惯的制度格局，因此是需要足够勇气的。

后 记

我跟一位在美国人的公司干了21年的台湾移民聊天，他说，美国之富不在大都会之富而在于乡村和农场也很富有。美国之发达，在于连很多小镇都有很高的工业水平，不少跨国公司的总部都在小镇上。“二战”美国能成为世界的“兵工厂”就因为那些小镇的工厂里都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武器。在美国旅游从东到西深感其各地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环境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地之间更多是特色上的差异，而非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美国当然有贫富分化，但人与人的发展机会基本是平等的。而且这里的所谓“穷人”（大多数有车（40%的穷人家庭还有两部车）有房（大部分是独立式的）有保障）所以贫富矛盾远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尖锐。美国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待遇很完善，公共汽车的车门都可以升降，以供残疾人的车子进入。总的感觉这是一个“匀态分布”的均衡社会。微软太突出了，政府还要把它分解掉。至于美国其它方面的均衡如政党政治的均衡政府权力

的均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均衡，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如传媒，大学，社团）的均衡，世俗社会与宗教力量的均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均衡，也各有道理和作用。方方面面的均衡结合在一起，使整个国家总体上很稳定，稳中求进。比较起来，我一直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在国际问题上却很缺乏均衡感，有时那么无知又霸道。

对中国来说，发展无疑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但均衡，正在引起从上到下越来越多的重视。追求均衡的发展，发展的均衡，我们将来也许会少点弯路和社会冲突。中央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在强调均衡，这是极富远见和深意的。

（摘自《南风窗》）

情 人

作家吴君出书一本，为促销售，签名售书。签名售书的第一天，买书的人寥寥无几，仅卖出9本。第二天，又有人献计，在书店门前做一广告，上书：今有知名作家吴君，携夫人共同签名售书。但生意仍然不佳售书20本。第三天，吴君携夫人刚到，见门庭若市。签名一天，腰酸背痛，售出书近千本。吴君好生奇怪，临走时才发现广告上改了一字：“携夫人”变成了“携情人”。

（摘自《大人笑话》）

“十五”计划新在哪里？

——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 韦 伟

○ 面临三个新的条件

记者问（以下简作问）：刘老，您参加了“十五”计划建议的起草工作。首先想请您谈谈“十五”计划面临着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

刘国光教授答（以下简作答）：我认为面临三个新的条件。第一，是生产力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十五”不是孤立的，它从“九五”走来。“九五”是我国改革开放 20 年来的一个重要的“五年计划”。这 5 年中我们实现了 8% 的增长速度，发展得比较平稳，使得我们的生产力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工农业产品短缺的现象基本结束，出现了买方市场，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条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体制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经济联系比原来更加密切了。经过近 20 年，特别是“九五”，我国目前基本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更面临加入 WTO 即更深地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形势。

○ 三个时期和三个“第一”

问：如何理解“十五”计划的重要性？

答：“十五”计划面临的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即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十五”计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就是重要时期的重要计划。“十五”计划是我们跨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们实现温饱和小康两个战略目标后，迈向第三个战略目标起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 一个指标，一个数字

问：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计划”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答：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并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但是政府要对我国的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和指导。没有政府的作用市场就会乱，所以订计划是必要的。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跟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是不同的。区别在哪里？现在的计划不是政府什么都要管，而是管大政策、大方向、大战略。在中央的

“十五”计划建议里你看不到大量的指标和数字，只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打算在 10 年之内，即在 2010 年比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翻一番，我们算下来就是每年增长 7.2%，就这么个指标。其他都是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重要的方向，重要的战略。

○ 思路非常清晰

问：“十五”计划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答：主要思路是 4 个方面。第一 发展是主题 第二是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这个叫主线 第三 两个动力，一是改革开放，一个是科技进步；第四就是编制计划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次“十五”计划建议共有 16 个部分 或者说 16 个方面。4 个方面的思路 就在这 16 个部分中体现出来了。

一个总的序言，把这 4 个方面的思路都讲了，然后整篇都讲发展。从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依次往下讲，这讲的是 4 个产业。再往后讲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开发、城镇化等 到此讲的是结构调整 这些就是主线。然后，围绕发展和结构调整 讲两个动力 科技进步创新和人才培养，以及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再往后，就是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编制计划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最后，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因为我们“十五”计划不仅是经济发展计划，也是社会

发展计划。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 关于发展的提法

问：发展是硬道理，这已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共识。“十五”计划为什么把它作为主题专门提出来？

答：中国的一切问题，都靠发展来解决。从国内来讲，我们还存在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不靠发展解决不了。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不发展更解决不了。

第二 从世界形势看 现在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竞争，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的压力，世界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有的国家，靠他们科技的强势、经济的强势压我们，我们要不发展，不赶上去了的话，面临的压力就更大。另外，强权政治的威胁也很大，我们要不把经济力量、国防力量搞上去，根本不行。

第三，我国资金的积累也是有潜力的，居民的储蓄率很高，在国民收入中占 40%。

第四 体制在改革 而且余地还很大。结构还要改善。

第五 我们和国际上有差距 差距就是潜力。差距克服了，就有后发优势。

但现在我们提出的发展和过去也不完全一样，“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是原来的提法，现在又提出“较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不是片面地追求速度。发展要有市场销路，不是为了生产存货，发展

『九五』，我们改写了哪些数字？

1% 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1995 年的 10.55‰ 下降到 1998 年的 9.53‰，这是自 70 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低于 1%。1999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 8.7‰。据统计，自 70 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少出生人口达 3.38 亿之多，并使世界 60 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 4 年。

2% 增发国债拉动 1998 年经济增长近 1.5 个百分点，拉动 1999 年经济增长 2 个百分点左右，2000 年上半年又拉动 2.2 个百分点。

3%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1%，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4% “九五”前四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4.3%，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4% 左右。

5% 1999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210 元，比 1995 年增加 632 元，年均增长 5.4%。

6% 199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854 元，比 1995 年增加 1571 元，年均增长 5.6%。

7% “九五”期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 7%。

8%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1%，预计 2000 年将达到 8.78 万亿元，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

9% 全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 1146 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8813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8.8%。

11% 5 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0.8%。

12% “九五”期间，粮食的年均产量比“八五”期间提高 12.4%，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 5 亿吨左右。

14%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1996 年的 8.5% 上升到 2000 年 1~7 月的 13.7%。

15% 1999 年底，我国外债的负债率为 15.3%，偿债率和债务率分别为 11.3% 和 69.5%，三者均保持在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之内。

19% 预计到 2000 年底，公路

要有效益，有质量，要有高档次。因此，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依靠体制改革，使得经济增长的质量要上去。

○ 关于国防建设

问：作为军人，我们当然关心“十五”中国防建设的问题。

答：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国防建设问题。国防建设在“十五”计划建议中虽然没有列题，但在第十六部分后面有单独一段。党的建设也是单独一段。国防建设问题没有多说。不多说，并不是不重视。

（摘自《解放军报》）

通车里程将超过 138 万公里，“九五”期间新增公路里程达 22 万公里 增长 19%。

21%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 1995 年的 8.1 平方米增加到 1999 年的 9.8 平方米 增长了 21%。

25% 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从 1995 年的 3.97 吨标准煤下降到 2000 年的 2.97 吨标准煤，下降了 25%。

27% 1998 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提供的占 26.5%，集体经济占 36%，非公有制经济占 37.5%。

28% 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组成部门由原来的 40 个减为 29 个，削减幅度达到 27.5%。省级政府平均精简 20% 左右。国务院及省级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减少了近一半。

33% 截至 1999 年底 股票市价总值已达 26471 亿元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33%。

37% 1999 年，我国新增电话用户 4129 万户，同比增长 36.7%，直接拉动电信消费 387 亿元。

39% 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由 1996 年的 34.7% 上升到 1999 年的 38.8%，4 年间增长了 4.1 个百分点。

46%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 45.5% 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储备。

47% 第三产业对新增国内生

产总值的贡献率“九五”前四年平均达到 46.6%，比“八五”期间的 29.1% 提高了 17.5 个百分点。

48% “九五”前四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 1995 年的 6500 万人减少到 1999 年底的 3400 万人 减少了 47.7%。

全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1995 年为 56.1%，2000 年将降至 48%。

50% 1999 年末 第一产业（农业）从业人员减少 104 万人 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由 1995 年的 52.2% 降至 1999 年的 50.1%。

55% 截至 2000 年 6 月，1997 年底的 6599 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已有 3626 户实现脱困，占亏损企业总数的 54.95%。

60% 国家在过去实施安居工程的基础上，加大了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规模，已完成经济适用住房投资 3959 亿元 年均增长 69%，竣工面积 3.4 亿平方米，年均增长 60%。

64% 到 1999 年底，全国 592 个国定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95 年的 824 元提高到 1347 元 增加了 63.5%。

65% 在利用外资方面 我国政府坚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方针，“九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利用国外优惠贷款数额占全国的 65% 以上。

66% 城镇居民已有 65.8% 的家庭拥有住房产权。

70% 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中，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 70%左右,从事非农业生产的约占 30%左右。

74% 1999年,商品房销售额 1202.77亿元,其中个人购房 891.95亿元,占全部商品房销售额的 74.2%。

77% 各级政府机关经过机构改革后,留岗人员的学历层次进一步提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数的比例由改革前的 69.7%上升到 77.4%,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数比例由 14%上升到 20.8%。

81% “九五”期间利用外资规模将达到 2900亿美元比“八五”期间增加 1300亿美元增长约 81.3%。

85% 到 2000年底,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可望达到 85%。

93% 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 1999年末已达 3940万人比 1995年末增长 92.6%。

95% 1998年底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为 94.7%农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也分别达到 83.8%和 86%这三项分别比“八五”末期提高 5.9.5.2.8.1个百分点。

100%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 1995年的 29662亿元扩大到 1999年的 59622亿元,增加了 101%。

(以上数据均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新闻办公室提供)

(摘自《解放军报》)

急于逃跑 的资本

□章玉贵

是引资大国,也是逃资大国

中国自 1994年起已连续 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仅“九五”期间吸收的外商投资就将达到 2900亿美元较“八五”同期增长 80%。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就在外来资本源源不断拥入中国的同时,国内资本也在加速实现外逃。所谓资本外逃,是指一国居民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或其他动机而将财富转移到本国政府管辖之外的行为。它是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20世纪 80年代由于当时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外逃资本的规模较小,每年只有几亿至十几亿美元;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资本外逃现象日益浮出水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5年中国已是世界第八大资本输出国。除了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还存在大量灰色的资本外逃。1993

年至 1996 年，每年的资本外逃数额均在 100 亿美元以上。另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估计 1997 年从中国外逃的资本约为 200 亿美元。1998 年更多，据樊纲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测算，当年中国外逃的资本在 480 亿美元左右。而北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则估计，1997 ~ 1999 年中国外逃资本额分别为 346 亿、386 亿和 238 亿美元。

由于资本外逃在我国对外经济运行中是一个“黑箱”要准确统计其具体数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透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从中不难看出国内资本外逃的严峻现实。因为从国际金融角度来说，一国的“误差与遗漏”规模应当是有限的，而且随着统计技术的不断改进，“误差与遗漏”的数额应该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是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1989 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仅为 3.3 亿美元，1994 年疾升至 98 亿美元，1997 年更是高达 169 亿美元。1982 年至 1999 年的“误差与遗漏”项目累计达到 1300 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吸收外资总额的 35%。而据中国银行资深经济师王元龙分析，中国历年的外逃资本金额肯定要比上年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大。

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俄罗斯和阿根廷的世界第五大资本外逃国，这种现象之所以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转移了人们对国内资本外逃的注意力。

哪些资本急于外逃

就目前外逃的国内资本来看，主要有三类：一是通过贪污、受贿、寻租以及出售国企等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另一类是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获得的巨额财富；第三类是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前两类资本的占有者是担心非法所得放在国内不安全而设法将其转移到国外；后一类资本的所有者则是担心合法财产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向国外抽逃。

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利用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漏洞和法制的健全，从中攫取的非法财富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统计。以价格与利率双轨制来说，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某些主管机构从两种价差中获得的利润数额每年高达 1000 亿元其中大约有 70% 的利润被转移到个人手中而成为私人资本；而国有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利差制造的“租金”，据吴敬琏先生估计每年亦有上千亿元人民币，某些有背景的人通过做贷款生意几个月之内就成了千万富翁。此外在房地

产炒卖风潮中也繁殖了数量可观的大小富翁。至于通过走私而聚敛的非法所得则更多，如轰动全国的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中的主犯赖昌星，其通过走私而转移到香港的非法资产就高达近百亿元人民币。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诞生的百万富翁数以百万计，亿万富翁也不在少数，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而其中通过合法经营致富的不到一半。这些暴富者，不仅拥有占全国居民存款总额40%以上的金融资产，而且还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不动产或存入私人“地下钱庄”。随着近年来国家对金融监管的加强以及反腐力度的加大，这些不法资产的占有者感到把钱放在国内实在不安全，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将其转移到国外。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就是这些不法资产的占有者。

在外逃的国内资本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合法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客观地说，在国内现有的法律环境下，合法的私人财产尚不能得到很好地保护，私有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担心有一天资产、人身遭遇不测，于是纷纷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求得自保，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据民主建国会北京经济学院支部和中关村试验区支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资产总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中，向国外

抽逃资本者已占三成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呈上升趋势。

资本是怎样逃出去的

国内资本外逃途径五花八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4种：

1. 假投资 真外逃

这是国内资本外逃的最主要形式。近年来，国内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的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近万家。其中部分是为了开辟国际市场，拓宽经营渠道，如海尔、春兰、康佳的海外投资战略即是如此。这对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提升国际竞争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法人却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适当渠道，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财产。保守估计，80年代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的资本就在500亿美元以上，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经由国家审批的。大陆的非法外流资本已成为香港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在欧美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据海外华人反馈回来的信息，近年来，欧美各国陡然增加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商，而且出手往往都是大手笔，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他们的资金来源和输出管道全都不合法，但其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法的。因为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还不到100亿美元。

这些外逃到海外的资本，往往采取分业经营，利润高的业务由私人公司来做，利润较低甚至亏本的业务则由国有企业来做。如果有赢利就中饱私囊，如果亏损了就算是投资失误或经营经验不足造成的。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成国内腐败分子的洗钱中心。他们内外勾结 沆瀣一气 使某些贪污腐败分子能够把非法所得堂而皇之地转移出境 然后进行分成、再投资 变个花样落入个人腰包。如果主管部门派人去查，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编造几个亏损的理由来对付，要想彻底查清几乎是不可能的。

2. 高报进口 低报出口

这是以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一些企业与外商串通，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 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回扣，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或者与国内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 让其代为购买设备 然后低价作高，共同分赃。而在出口环节中 由于国家近年来为鼓励出口 采取出口退税政策，一些企业趁机大肆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或者采取合同发票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额的做法，一方面换取国家退税 另一方面使应收外汇资金减少，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而达到资本外逃的目的。

3. 逃汇、套汇、骗汇

1997年7月亚洲发生金融危机

以后，受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影响，也有对人民币贬值的议论和心理预期，国内部分出口企业公然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推迟出口收汇和结汇，或收汇后不是按规定将其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是把出口货款私自存放境外搞投资，或者存入离岸银行账户而未汇进国内；有些企业则以提前偿还外债本息、支付进口货款的名义，通过各种方式套取人民币货款，购买外汇。实际上并未提前付汇，而是将外汇资金滞留境外进行投资和投机。更有甚者，与外商勾结，以外商逃债、毁约、拖欠等形式，应收的外汇不收回来而是分成后转移到个人账户上；或以出国旅行为由从银行进行频繁的小额骗汇后将资金转移出境。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透露，近年来由于套汇、逃汇和骗汇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上百亿美元。

4. 扮成外资外逃

由于国家对外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许多国内的中资企业为了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也为了方便资本外逃，往往采取与自己在境外的中资企业进行合资的办法，合资企业的出资额实际上都由国内的中资企业垫付，然后将利润以外资收益的名义汇出。或者以合资企业的名义对外借债，资金不进入，却以还本付息的名义向外付汇；一些境外的中资企业也如法炮制，将应汇回境内的利润，以外资名义向国内再投资，将应

属于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境外。

境内外不法分子通过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资本外逃，同时还造成了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虚假繁荣景象。近几年，虽然我国每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都在 300 亿美元以上，但其中约有 80% 是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资金，来自欧美和日本的不足 20%！许多所谓的外商投资只不过是国内的资金经由香港等地再“回流”国内，以享受外商投资的特殊待遇。而这些身揣国家财资，扮成海外华人的不法分子，却常常受到各地政府官员的夹道欢迎。

除了上述 4 种主要的逃资途径以外，国内资本还常常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外逃，如以非贸易支付的方式，通过向境外支付特许使用费、咨询费、培训费等名义，向外转移外汇资金；或者采用蚂蚁搬家战术，将外汇资金以境内居民汇款的方式，多批次汇出境外而实现资金转移。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是不会发生资本外逃的。我国由于处在经济转轨阶段，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防止资本外逃的“软硬件”尚不具备，从而给资本外逃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如过去那些来历不明的外汇之所以能够通过合法渠道卖掉，就是借助于外汇调剂

中心。当初国家设立外汇调剂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境内外商投资企业调剂外汇余缺提供便利渠道，不想却被一些国内企业和个人用作资本外逃的重要途径。而海关、银行、外汇局之间缺乏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也使某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当然国内资本能够“顺利”外逃，更离不开国内某些腐败分子的“密切配合”。以厦门远华走私案来说，其主犯赖昌星长期疯狂走私，并将数十亿黑钱转移至香港，就是在厦门海关、银行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

日益猖獗的资本外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削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而且动摇了人们对人民币汇率持稳的预期，增加了防范金融危机的难度，甚至可能直接诱发金融危机。因为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如果持续外逃导致汇率持续下降，必然制造恐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资金外逃，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资本外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还未充分显现出来；但如果我们对之掉以轻心，迟早将会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方面，墨西哥与东南亚国家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

（摘自《南风窗》）